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动荡变革期”的学理阐释
作者: 孙西辉, 于春泉
DOI: 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40905.001
收稿日期: 2024-01-25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9-06
引用格式: 孙西辉, 于春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动荡变革期”的学理阐释[J/OL].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40905.001>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网络首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动荡变革期” 的学理阐释

孙西辉^{1,2}, 于春泉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战略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准确的战略判断有助于推动党和国家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战略认知和战略判断, 认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是对当下国际形势整体特征和性质的战略论断, 也指出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对相关战略论断进行学理化研究, 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动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 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动荡变革期”; 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

作者简介: 孙西辉, 男, 外交学博士, 副研究员、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美国的亚太战略、周边国家对外战略、中美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研究; 于春泉,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学生。

中图分类号: D61;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24)04-0000-12 **收稿日期:** 2024-01-2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当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 世纪疫情影响深远,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①这一表述体现了我党对世界局势的战略认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是对当前国际形势整体特征和性质的战略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 战略上谋划得科学, 战略上赢得主动, 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②。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内外形势演变对不同时期的国家发展环境做出许多重要的战略判断, 指导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准确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的内涵与形成机理以及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有助于深入理解相关战略论断, 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

*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2024 年度重点项目“社会科学理论建构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化研究”(项目编号: 2024XYZD13)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26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589 页。

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成机理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的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国际形势整体特征的战略判断。国际形势是国际环境的外在表现,取决于国家间力量对比、国家间战略关系和国家间互动方式。换言之,国际形势及其变动与国际关系的变动密切相关。国际现实表明,国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可变革性三大特性。这三大特性凸显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核心原因。国际制度失灵与国际秩序失范、认知局限与观念差异、能力跃迁与权力转移,是三大特性凸显的主要原因。讨论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及其凸显机理,可以表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的逻辑。

(一) 不确定性及其凸显机理

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指国际行为体基于自身认知无法确定事物基本状态和发展趋向的情况。换言之,国际关系行为体无法确定其他行为体意图、行为体互动与所处环境的基本情况和演化结果,无法确定在国际关系中具体会发生什么事、发生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产生不同结果的概率是多少。

首先,国际制度失灵与国际秩序失范是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凸显的制度性因素。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处理不同领域问题的规则、机制和程序的集合,通常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②当前的国际制度主要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主导制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受美国等国家单边主义政策的冲击和制度自身缺陷影响,当前国际制度的不合理性突出,出现制度失灵问题。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分配和义务履行上分歧严重,导致近年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方面难以发挥有效的制度作用。国际制度失灵使各国在应对各类紧急安全问题和全球性问题时缺乏及时有效的响应机制和处理能力,难以迅速有效管控危机和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利于国际社会达成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使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凸显。

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的有序行为状态,取决于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③当前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基于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形成的国际和平稳定状态,许多国家从中受益,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西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国际规范日益受到非西方国家的质疑,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制度在许多领域失灵,导致国际秩序失范。在多元文明背景下,新型国际价值理念不断涌现并与西方价值观产生摩擦和冲突,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受到非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挑战。新兴国家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继续探索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和新型国际制度机制,改革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导致主要国际力量间的激烈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现有国际秩序的脆弱性和可持续性将进一步凸显,各种国际力量围绕未来国际秩序的挑战、转型和变革路径方案的斗争将日益激烈且长期化,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随机性与偶然性将给国际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其次,认知局限和认知差异是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凸显的观念性因素。认知方式、信息不对称、认知手段等因素导致行为主体的认知局限,决定了人类无法全面准确认识国际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这是不确定性产生的客观基础。无论是个人、群体还是国家,其认知能力都受到认知思维模式、所能接收到的信息量和所掌握的认知辅助技术工具的限制。这决定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主体互动和整体环境的基本状态与发展态势难以有全面完整的认知。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及国际社会的复杂反应,表明不同国际行为体在预估和分析各方意图和事件演化方向时的认知局限性。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和智库大多低估俄罗斯开展军事行动的决心与规模,俄罗斯可能也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决心和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21页。

②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3-4.

③ 阎学通:《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1期。

能力及西方国家支援乌克兰的力度。国际关系行为体间的认知局限可能导致认知偏差和战略误判,增加行为体间互动的不确定性。不同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深刻影响一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事务的认知和处理方式,导致不同国家对同一客体产生认知差异。这也可能使不同国家在互动过程中出现误判,带来国际行为体自身认知视角下的不确定性和国际关系中主体间互动的不确定性。畅通稳定的沟通交流渠道对国际行为体间交流信息和交换观点至关重要,但当前国际关系中许多双边和多边沟通渠道的脆弱性凸显,有效沟通的缺失可能使国家间战略误判增加和国家间摩擦与冲突增多,导致国家间互动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

最后,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能力跃迁和现有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的物质性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深刻影响国家和全人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但科技的发展方向 and 复杂影响往往超出人类原有知识基础的认知和评估水平,人们无法准确预知未来科技会在哪些领域出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新兴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新能源、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快速发展,各国对这些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态势和运用程度将决定其发展潜力和未来的综合实力。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强科研投入,但目前无法确定未来哪些国家能抓住重大科技创新突破机遇并持续提升综合实力。科技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科技应用影响的复杂性会显著提升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此外,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也使人类社会发展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由于当前缺乏灵活有效的前沿技术监管机制,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展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对人类的伦理道德、价值实现和生存安全构成潜在挑战。

在科技创新与应用等因素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更加明显,从而引发所谓的“权力转移”。这导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加剧,进而增强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关系,尤其是管理竞争和管控分歧,成为影响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未来美国和新兴大国的实力地位及影响力的变化态势,将深刻塑造全球与世界各主要区域的地缘政治格局。此外,互联网技术普及应用、气候变化以及极端恐怖主义活动等也是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凸显的重要因素。

(二) 不稳定性及其凸显机理

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指国际行为体、行为体间的关系和行为体所处的国际环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主要体现为国家内部、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

第一,不稳定性凸显的制度性因素。国际制度部分失灵意味着,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面对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时,缺乏有效的危机管控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难以及时有效应对区域安全危机和全球安全挑战,使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尽管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卫生治理机构积极应对全球疫情,但由于世界卫生组织自身的机制局限性和部分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世界各国在团结合作管控疫情传播方面困难重重,新冠疫情迅速在全球传播并给世界卫生安全环境带来显著的不稳定性。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僵化,政策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使其内部治理效能低下,政治不稳定性和社会不稳定性凸显。

第二,不稳定性凸显的观念性因素。观念因素是影响国家决策和战略行为的背景性因素,国际行为体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具体认知是决定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观念差异、认知冲突以及国家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商机制,增加了决策中的认知偏差,战略误判和互信赤字,使国家间的摩擦乃至冲突增加,导致双边和多边关系紧张,使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提升。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①。中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重要国际力量在观念和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和分歧,这使相关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凸显。中美两国在战略观念和认知上有较大分歧,且缺乏战略互信,两国在台海地区和南海地区发生军事摩擦和冲突的风险逐渐加大,

^①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

增加了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此外,一些国家内部在利益观、文化观、意识形态和宗教理念上的分歧和矛盾突出,国内各行为体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相关国家内部政治对立、宗教冲突和族群暴力明显。这对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和区域安全环境的稳定性构成显著挑战,也增强了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

第三,不稳定性凸显的物质性因素。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东升西降”态势和多极化趋势明显,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与区域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上升。例如,美国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唯一的霸权国,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产生日益严重的霸权焦虑和秩序焦虑。在此背景下,美国试图护持霸权并遏制中国快速发展,推动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打压遏制中国,中美矛盾和摩擦显著增加,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美国为维护自身的影响力和领导地位,除了不断强化自身实力和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还积极拉拢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围堵中国,这使中国与相关国家关系的不稳定性随之增强。此外,世界经济的显著下行压力和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凸显,也使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

(三) 可变革性及其凸显机理

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指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互动方式和国际秩序有随着国际体系中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变化而演化和变革的可能性,主要体现为国家发展模式、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可变革。

第一,可变革性凸显的制度性因素。国际制度的效能不足,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凸显,全球治理问题的挑战日益尖锐,难以有效应对各类发展问题和国际安全问题,国际制度的可变革性日益明显。由于历史原因,当前西方国家在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的投票权份额、人事安排和议题设置上有显著优势和影响力,许多国际组织的议题无法反映非西方国家的主张和利益。现有国际制度需要进一步调整、改革和完善,以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各方利益诉求。如,国际社会在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上进展缓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气候治理责任分配的矛盾突出,这反映了现有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在应对全球气候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另外,部分国家内部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凸显,无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国内各类社会治理问题突出,国内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可变革性凸显。国内社会制度如何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进行改革与完善以及如何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很多国家重要的政治议题。例如,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凸显,主要表现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激化,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常因政党利益受阻,重大立法和改革难以推进,社会矛盾突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

第二,可变革性凸显的观念性因素。在国际社会多元文化和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基于本国的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围绕国家治理、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提出多元的观点主张和路径方案,为发展模式变革和国际秩序变革奠定了理念基础。例如,中国探索的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①

第三,可变革性凸显的物质性因素。当前国际形势中的“东升西降”态势明显,国际力量对比向着东西方整体均衡的方向持续演化,为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实力基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几十年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快速增长,但是目前尚未获得与其实力完全匹配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这使它们有意愿和能力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中谋求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例如,“金砖国家”成立新开发银行,加强经济合作,这是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积极拓展国际影响力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显著例证。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二、“动荡变革期”的形成机理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①的论断。“动荡变革期”是对特定阶段国际形势性质的战略判断。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凸显不仅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产生,而且决定国际形势具有“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总体性质,这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形势整体特征相对应。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爆发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持续提升并达到其发展演变的临界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一)现实基础

愈发复杂多元的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持续增强的现实基础。多元性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突出特性,主要包括文化多元性、利益多元性和权力多元性。文化多元性具体表现为文明、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利益多元性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复杂多元,以及这些利益的相互交织。权力多元性主要体现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分散和权力主体多元化。国际社会多元性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程度提高,也是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现实原因,并为可变革性的演化带来阻力和条件。

第一,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国际社会多元化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在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中,由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利益诉求和实力状况,俄乌当事国、美国、欧洲国家、中国、印度等均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对该事件的认知和表述大相径庭。各国对俄乌冲突涉及的对俄制裁、大国关系、地区安全、全球能源供应、全球粮食供应等具体问题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政策措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措施也做出不同的反应,俄乌冲突的走向及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第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强。国际社会多元化导致现实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强的案例俯拾皆是。例如,以2010年12月突尼斯自焚事件为导火索的“阿拉伯之春”很快蔓延到中东地区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并在叙利亚、也门等国引发长期内战。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具有不同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背景的群体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一些群体甚至组建实力不等的武装力量,与政府及其他力量团体爆发长期军事冲突,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在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的介入下,中东各国国内局势、地区安全形势和国家间关系长期动荡,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强的重要体现。第三,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持续发展。一方面,国际社会多元化为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提供了条件。在美联储持续加息、西方对外制裁、美国推动大国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下,许多国家对美元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实施以本币交易为主要手段的“去美元化”措施。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是部分国家因美国制裁被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被迫“去美元化”,有些国家主动探索多元化的结算方式,更多国家是因为深受美元霸权盘剥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不同动机下的“去美元化”冲击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反映了国际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各国完善国际金融秩序的愿望和努力,也为进一步推动完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多元化有时也是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的阻力。在2023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中国、欧盟、美国、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各方的差异化立场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多元性,导致与会各方在减碳技术路线、落实气候资金和气候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分歧难以消弭。^② 尽管通过“加时”讨论最终达成了“阿联酋共识”,但落实这一共识任重道远。^③ 这使世界各国完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体制机制面临巨大阻力。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②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http://www.news.cn/world/2023-11/30/c_1130000565.htm, 2023年11月30日。

③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加时”后达成“阿联酋共识”》, http://www.news.cn/world/2023-12/13/c_1130025932.htm, 2023年12月13日。

(二)主要动力

三大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交织演化是其持续增强的主要动力。在当前复杂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and 可变革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交织影响,推动这三种特性持续演化增长。

第一,不确定性增强会显著增加不稳定性,影响可变革性。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提升,可能使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降低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国家发展前景的预期。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进而导致国内社会不稳定性提升。一国对外政策中的意图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加国家间的误解和误判,使国际冲突的风险上升,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上升。此外,战争局势的走向和外溢风险、大国贸易摩擦的升级风险和外溢影响、国家间谈判协商过程和结果等国家互动的不确定性,都会给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国际社会中不确定性的提升,使国际秩序变革的难度更高,周期更为漫长。以美国对华“脱钩”政策为例,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大幅增加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限制中国学者和留学生赴美,禁止高端芯片和光刻机对华出口,绕开中国重组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尽管这种做法在美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和政治共识,但两党在实施方式和手段方面存在差异,使该政策在具体实施中的不确定性增强,这使中美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强。同时,由于美国实施涉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提升,中美关系受到极大影响,妨碍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间的合作,这可能阻碍改革国际制度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努力与进程。

第二,不稳定性是不确定性演化的重要基础,并为变革提供条件。当前各国内部、国家间关系以及国际安全环境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凸显了国内制度、国家间关系模式和国际制度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为可变革性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关键动力。不稳定性的凸显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关系行为体认知和预测国际关系的难度,不稳定性的提升使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朝韩分别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对峙和对抗状态,双边关系起伏不定。2023年11月21日,朝鲜用“千里马-1”型新型卫星运载火箭成功将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发射升空。^①22日,韩国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止2018年签署的韩朝《〈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中限制韩方对朝侦察活动条款效力的议案。23日,朝鲜宣布不再受该协议的约束。^②这意味着朝韩对抗升级,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性增加了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各种突发状况不断。12月30日,朝鲜领导人在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朝韩关系不再是同族体系,而是完全的敌对关系。^③2024年1月4日,韩美在靠近朝韩军事分界线的京畿道抱川市举行联合军演。1月5日,朝鲜在西部海域进行炮击训练。^④1月6日,韩国称朝鲜再次发射海岸炮,但朝鲜否认韩方的说法,称未进行炮击训练,而是炸药爆破。^⑤极不稳定的朝韩关系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构成重大冲击,中美俄等大国需要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推动相关国家保持克制并加强沟通,这也意味着朝韩关系和应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机制具有一定的可变革性。

第三,可变革性导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国家发展模式、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方面的可变革性,可能加剧行为体间权力与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这导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凸显。阿根廷的经济社会长期处于短暂发展和长期停滞的循环中,民众要求变革国家发展模式的呼声不断高涨,政客的相应变革主要体现了对以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的不同接受程度。新任阿根廷总统米莱采取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试图通过所谓的“休克疗法”拯救经济,并大幅削减政府部门

① 《朝中社称朝鲜成功发射侦察卫星“万里镜-1”号》,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sp/10115983.shtml>, 2023年11月22日。

② 《朝鲜国防省:朝鲜军方从即刻起不受〈板门店宣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约束》, <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3/11-23/10116719.shtml>, 2023年11月23日。

③ 《朝鲜劳动党八届九中全会闭幕》, <http://www.xinhuanet.com/asia/20240104/f56ac18c28904394a5111611c4cc3888/c.html>, 2023年12月31日。

④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朝鲜军队进行了炮击训练 韩国实施了应对海上射击》, <https://news.cctv.com/2024/01/05/ARTIz1SLZdXaOlmr7xXDWgiu240105.shtml>, 2024年1月5日。

⑤ 《朝中社:朝鲜否认6日进行炮击训练》, 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1_07_721539.shtml, 2024年1月7日。

和公共福利开支。这种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导致该国社会不满和游行示威增加,使经济社会的不稳定性和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提升。此外,不少国家热衷于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但各国在该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存在显著差异。以印度、巴西、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地区大国希望通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大国地位或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权,而现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维持“一票否决权”并限制新的常任理事国拥有该项权力。在相关国家“入常”的问题上,各国特别是相关大国间的博弈导致国家间关系显著波动,也影响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秩序,使国际秩序转型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

(三) 催化因素

突发性重大国际事件是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显著增长的重要催化因素,它具有发展演化迅速、影响范围广的特征,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在短期内往往难以及时有效应对这些事件以及有效管控这些事件的外溢影响和发展趋向。这些事件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冲击会直接增强相关国家内部、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突发性重大国际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演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情况,往往暴露现有治理体系和制度的短板与不足,进一步凸显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

2020年开始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显著增加。新冠疫情作为突发性重大国际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影响世界各国的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这使世界经济在短期内遭受重大冲击,严重损害各国经济社会、全球经济安全环境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环境的稳定性。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经济复苏的方式和速度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疫情防控不力和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不足,使全球疫情的发展趋向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对华认知存在明显偏见,中美在疫情防控问题上的分歧显著,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上升。此外,疫情防控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也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缺陷,凸显公共卫生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这促使各国重新评估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并实施国内相关改革,也促使国际社会思考如何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可变革性进一步凸显。

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促使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持续提升。作为突发性重大区域军事危机,其烈度变化、未来走向和最终结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复杂多维影响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遭受显著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增加了全球经济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俄乌冲突的延宕加剧了欧洲军事安全局势的紧张,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明显增加,欧洲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显著增强。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实行全面制裁,大国关系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俄乌冲突及其外溢影响促使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新审视集体安全过度扩张的复杂影响,也促使世界各国重新评估和调整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道路、军事战术和军队发展道路及区域安全合作与本土国防能力建设,国家发展模式、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可变革性显著提升。

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推动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进一步显著提升。巴以矛盾由来已久,但此轮巴以冲突作为突发性区域军事冲突事件,本身具有较为显著的不确定性。随着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武装相继介入,巴以冲突的未来走向和外溢影响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解决巴以问题的不确定性也显著增加。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在红海打击与以色列有关的商船,以及美国纠集多国发起“繁荣卫士”军事行动,再次加剧了中东安全局势的紧张程度,使全球能源安全和海上航道安全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不稳定性提升。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中东国家和域外主要大国的行动和立场差异显著,国家间关系的不稳定性显著提升。巴以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美国长期以来是调解巴以问题的主导力量,但其明显偏向以色列的立场使美国在斡旋巴以问题中的信誉下降。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需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力度,限制美国等域外大国的军事介入,推动各方停火与对话,巴以问题协商调解机制的可变革性进一步凸显。

三、中国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

机遇指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和境遇,战略机遇一般指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持

续发展和实现其总体战略目标的重大有利条件。风险指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组合,挑战指特定主体需要应对和克服的问题与困难。战略机遇期是客观时机与较高目标追求的国家总体战略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可持续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发展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现实,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战略机遇期的思想,强调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延续性和新变化,指出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

(一) 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论断的阶段性的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提出一系列重要战略论断,这些论断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召开前,侧重强调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延续与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②2012年1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做出具体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是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更趋复杂。”^③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变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④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战略机遇期。他指出:“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⑤

第二阶段,党的十九大至二十大召开前,侧重强调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与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⑥2019年5月,习近平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与战略机遇并存:“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⑦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机遇与挑战的发展变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⑧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进一步阐述:“我们的判断是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⑨

第三阶段,党的二十大至今,侧重强调我国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二十大报告指

①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36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7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7页。

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作重要讲话》,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6/c_114044452.htm,2012年12月16日。

⑤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⑦ 习近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⑧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7月31日。

⑨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21页。

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②2023年2月，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③

（二）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

随着国际关系的三大特性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准确理解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塑造机遇，应对与化解风险挑战。

首先，科技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进一步增强，这是我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新兴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前沿科技快速发展，^④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演进。这将极大解放生产力，深刻改变社会面貌和生产生活方式，重塑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全球科技格局。这为中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为中国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供了有力抓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改变，中美综合实力差距持续缩小，世界呈现“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凸显。这为中国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反对霸权主义行径、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和有利条件。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改变，新兴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推动国际关系变革的能力、意愿和条件越来越充分，国际关系的可变革性进一步增强。发展道路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国家发展模式变革的潮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国家间关系形态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可。国际秩序方面，当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性愈发突出，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为中国进一步推动完善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机遇。

其次，冲突与动荡频发，全球安全与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强，这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当今世界，地区冲突频发，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各领域围堵、打压和制裁中国，搅动周边地区局势，这是我国发展面临的严峻安全风险和外部挑战。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所谓“去风险”为由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去中国化”。这使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遭受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前景不乐观，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挑战显著增多。在冲突与动荡频发和国际安全与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持续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中难预料因素进一步增多，给中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稳定、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最后，在动荡变革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复杂交织、相互转化。“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⑤。一方面，战略机遇中有潜在的风险和挑战。争夺新兴科技革命的发展制高点将成为主要国家的关键竞争领域，中国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必将面对世界主要科技大国的激烈竞争和美国的科技制裁打压。另一方面，风险挑战中蕴藏着重要机遇。在全球安全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积极维护本国安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②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

③ 《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年3月1日。

④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共产党员》2021年第8期。

⑤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页。

境稳定,将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经贸合作环境,提升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因此,“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①

(三)把握机遇与应对挑战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应增强变革意识与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中日益凸显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可变革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更好地把握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中国积极探索有利于“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正能量”^③的中国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核心内容包括:

第一,中国积极提倡新的外交理念和规范,推动完善国际秩序。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以“负责任大国”、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和“亲诚惠容”为核心的新型外交理念,提出以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支持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理念,提出以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注重海外利益中国保护和维护世界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利益观。在国际规范方面,中国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安全观、亚洲安全观和核安全观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积极探索和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着力完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积极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指出,“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④

第三,中国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推进,“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⑤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和全球人权治理。

第四,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旨在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习近平强调,“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⑥。

第五,中国积极探索现代化新道路,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⑦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促进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并为各国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2页。

②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第4页。

③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9257.htm,2023年8月23日。

④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06/c_1127414895.htm,2021年5月6日。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⑥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2-43页。

⑦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各国一道,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提供新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动荡变革期”的战略论断体现了我党对当前国际形势整体特征与性质的判断,两者的形成与发展有内在逻辑。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可变革性持续增强,国际社会无序化趋向进一步增强,国际体系的秩序程度下行压力增大,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善于危中寻机、转为危机,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确定性预期、促进稳定性的手段和合理的变革方案。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方案,为中国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营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论断体现了鲜明的演进逻辑。第一,党中央对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认识体现了鲜明的继承性和发展性,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条件、具体机遇和挑战出现新变化,由强调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转变为强调我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第二,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增加,风险挑战愈发复杂、愈发严峻。第三,聚焦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凸显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日趋错综复杂。第四,更重视积极主动塑造有利形势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从注重把握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演变为强调应对挑战和塑造机遇,善于危中寻机、转危为机,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② 基于上述认知,中国辩证认识国内外形势,将本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为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Navigating Global Transform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SUN Xihui^{1,2}, YU Chunquan²

(1.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re crucial to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Party and the nation, and accurate strategic judgments are essential for advancing their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ic awareness and judgment. It recognizes that the world is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not seen in a century, characterized by accelerated evolution and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Concurrently, China's development is at a juncture wher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coexist with risks and challenges, marked by increased uncertainties and unpredictable factors. This perspective reflect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of the fundamental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highlights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is navigating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these strategic judgments can enhance our ability to seize opportunities, mitigate risks, and address challenges, thereby fostering China's and the world's commo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t aims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solutions, and strength to addressing shared global challenge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Key words: unprecedented changes not seen in a century; a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nd challenges

[责任编辑 王 昊]

① 《习近平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4/21/c_1129545705.htm, 2023年4月21日。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21/c_1123887379.htm, 2018年12月21日。